

地名，别再说改就改

本版稿件均由
本报记者彭训文
采访、整理

这两天，作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的李辉很忙，很多网站、报纸争相采访他。“这说明国人如今对像地名这样传承地方文化符号的东西更重视了。”在人民日报社编辑楼的咖啡厅坐定，李辉笑着解释。29年前，李辉写下《可惜从此无徽州》一文，反对将徽州改为黄山。今年4月，借全国开展第二次地名普查契机，李辉再次撰文《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引发黄山是否复名徽州的大讨论。

近年来，一些地方改名时有发生。今年5月30日，江西省庐山市正式挂牌成立，原庐山区更名为九江市濂溪区；今年初，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也改为播州区。同时，水城县欲改为“夜郎市”、琅琊山“会峰阁”更名为“琅琊阁”……这些地方为什么要改名？为何要复名？相关社会学家表示，地方改名涉及复杂利益博弈，它不一定等于发展，政府决策应吸取专家和群众意见，减少改名导致的割裂传统等负面影响。

地方复名

利益纠葛还是赓续传统

“曾听某省民政厅干部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台湾老兵让孩子回来寻根。孩子归来，却难以找到，原来这个地名早已消失。经过民政厅翻阅档案，才找到原来地名。这位老先生写信来感谢民政厅同志，并说：‘你们经济发展得很好，建设也很好，但是地名不要改。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标。’”

李辉说，这个故事深深感动了他，“中国人都有寻根观念，一个地方地名和当地文化、家族传统相连，对于海外华侨华人更是如此。”

早在1996年，李辉便呼吁将荆沙恢复为荆州，两年后，荆州地名恢复。2001年，李辉撰文《襄樊何故称襄阳》，推动襄阳复名。但由于襄樊这一名称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使用，整个更名过程持续了近10年。

对于襄阳复名得以实现的原因，李辉表示主要是当地政府的响应。“对于襄樊这两个字，尤其是当地政府到海外招商时，很多海外华侨华人表示不知道在哪里，对新地名没有认同感，这是襄阳复名成功的关键。”李辉说。

徽州更名黄山市已近30年，其复名意义何在？李辉认为，徽州区域性文化的丰富性在全国也十分少见，比如徽派建筑、徽墨、宣纸、徽商，都是历经千百年形成的。“如果这个地名能够恢复，对中国各地今后地名的稳定性来说会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李辉说。

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飞对此颇为赞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20多万件反映徽州民间社会态度的文书契约陆续被发现，被称为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此外，研究徽州商帮、民俗等的徽学，已成为与敦煌学、藏学并立的中华文化三大显学之一。而这一切，是‘黄山’二字所不能包容的。”

近年来，安徽民间要求恢复徽州的声音一直很强烈，但



曹一作（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5月30日，江西省庐山市正式成立。图为工作人员悬挂庐山市人民政府的牌子。一旁是刚刚取下的星子县人民政府的牌子。
新华社记者 周 密摄

当地政府的的态度令人玩味。

今年4月，黄山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接受人民网安徽频道采访时表示，更改市级名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作为民政部门，将深入调研，尽早提出建议。而在2014年，该局回应《省长，我建议把黄山市改名为徽州市》的群众来信时称：“黄山建市以来的发展成就表明，成立地级黄山市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这其中既有历史原因，也有行政区划改革和地方财税利益分配和使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陆益龙是安徽省枞阳县人，他对本报记者表示，行政区划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后，复名“徽州”就不是简单恢复一个名字那么简单，而是涉及行政区划问题。不过他同时表示，“在现有体制下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

地方改名

整合资源还是刮“复古风”

除了恢复地名，一些地方也在进行改名。

今年5月30日，江西省庐山市正式挂牌成立，当地民众争相来到市政府门前拍照留影。改名后的庐山市由江西省直辖、九江市代管，此次改名还涉及将原庐山区更名为九江市濂溪区、原星子县被撤销、其下的蓼花镇也更名为星子镇等。

为何要进行此次改名？九江市公布的数据显示，此前围绕着一座庐山，有庐山管理局（管理景区33.8%面积）、庐山区（管理景区28.6%面积）、星子县（管理景区33.1%面积）、九江县（管理景区4.5%面积）4家单位分割管理，

导致“山上山下”不一样、“山南山北”不一样。

因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庐山各界便开始了设市的动议。此次调整前，九江市各级政府做了大量调查工作，经过广泛调研，大多数老百姓都赞成设立庐山市。

九江市委书记杨伟东表示，换个“马甲”其实不简单，应该看长远。庐山设市后将努力做好“环庐山、大庐山、泛庐山”文章，实现“1+1>2”的效果。

除了统一资源和管理，算文化账也是一些地方改名、复名的动因。今年初，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改设播州区，并对相关镇进行改名。据介绍，播州一词从唐朝贞观十三年出现，到明万历二十八年结束使用，前后存在了960多年。

遵义县县委书记黄国宏说，新的播州区将从以往的“单打独斗”融入遵义全市发展的“大合唱”舞台，有利于遵义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出现了借传统文化、借依傍古人等进行“复古改名”的现象。例如鹿邑县欲改为“老子县”、水城县欲改为“夜郎市”，琅琊山“会峰阁”则在古装电视剧《琅琊榜》热播后悄然更名“琅琊阁”，一些地方更是为了“西门庆故里”之名争得面红耳赤。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表示，像涉及行政区划调整以及相应的改名问题，政府决策应努力追求更加科学，多听取专家和群众意见，避免给群众留下“关起门来决策”的“拍脑袋”印象。

陆益龙也认为，借古人、名人、名山大川等改名、复名，在短期看可能会带来一些经济效益，但从一个地方的长期发展来看，制定符合地区实际的经济政策，找到地方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正途。

陆益龙建议以法治规范地方更名：

改名要有严格程序约束

对话



陆益龙 安徽省枞阳县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庆师范学院兼职教授，著有《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批判》、《中国历代家礼》等专著。

记者：现在在中国各地流行行政地名、恢复地名，它有利于如今社会治理模式发展创新吗？

陆益龙：这是各地快速发展、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色。改名通常是政府在调整行政区划格局时所推进的行政行为，这和社会治理的理念不同。社会治理的核心，就是倡导无权力特别是无行政权力和影响力的民众能够有渠道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治理中来。很显然，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自认为的”能提高行政效率和公共利益的目的，推动行政区划及其名称的更改。这对当地政府而言是有利的，而对普通百姓来说可能并不一定有利。

记者：为什么行政区划及其名称的变更频繁出现？

陆益龙：其根源在于一些地方还是“人治”政府，而非法治政府。某些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他的理念、想法和喜好都会

在行政行为中得以体现，而较少受到法制程序的规制和约束。

记者：更改地名需要遵循什么标准？

陆益龙：地名既是地方的，也具有公共属性，应尽量保持延续性和唯一性，原则上不应轻易更改。如要更改，应该有严格程序约束，约束的核心就是要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改名是必要的，而且对公共利益是有利的。在程序上，既要有专家论证、行政调查论证，还要有地方立法机关的审议和民政部的审批。

记者：作为安徽人，您如何看待徽州复名？

陆益龙：在徽州复名问题上，我个人极力支持，因为“徽州”这个名字背后有太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深厚的历史渊源。但这并不等于我支持其他的所谓“恢复地名”的行为，因为这些恢复旧名行为其实也是一种改名行

为，一定要严格把关、慎重推进。

记者：您对规范各地方改名有何建议？

陆益龙：现在行政区划及其名称的更改，主导权主要还是在行政系统，统一的法律规制和约束力还不明显，一般只要地方政府将相关报告送到上级主管部门，通过审批即可推行实施了。为规避行政行为的随意性，需要加大法律对这一行政程序的制约作用，其中包括立法系统的审查程序和司法系统的追责程序。

另外，我强烈呼吁相关部门要警惕一些地方政府借治理创新之名，轻率地改变行政区划及其名称，或是轻易推进合村、并村的行为。任何没有经过严谨科学论证和广泛征求民意的随意行政行为，都会造成很多破坏历史与自然资源的不可逆的后果。我呼吁中央政府对此类行为加大监管和指导力度。

李辉回应“黄山”复名“徽州”：

诸多质疑不应熬成一锅粥



李辉 《人民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世纪90年代初，撰文《可惜从此失荆州》，推动湖北省荆沙复名荆州；1998年，撰文《可惜从此无徽州》，反对徽州更名为黄山；2010年，撰文《襄樊何不称襄阳》，推动襄阳复名；今年4月，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掀起徽州是否应该恢复的大讨论。

记者：最近有报道认为，将“黄山”复名为“徽州”可能会导致很多问题。比如，是否考虑到“黄山”这一名字对当地经济拉动作用，对此，您怎么看？

李辉：改名黄山后，当地旅游业是发展了，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因为注重自然景观的保护，与此不相关的文化景观很多被破坏掉了，现在徽州的老房子、老建筑已经很少了。再比如，最近10多年来，黄山当地经济收入远比附近的九华山要低得多。打造徽文化和油菜花旅游的婺源，旅游收入增长速度也很快。

因此，改地名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让一个地方经济长盛不衰，相反可能让一些地方的经济失去了向纵深发展的机会。现在可行的办法是，强调徽文化的徽州设市后，主打旅游的黄山可以作为一个区存在，实现旅游与文化并举。

记者：您认为怎样才能避免轻率改名？

李辉：一个地方的改名，涉及到程序问题。现在很多地方改名就是一些政府领导脑子一热，说改就改了。但是，地名和生活当地的群众关系最密切，需要多征求他们的意见。

所以，我非常赞同无论是改名还是恢复地名，都要有严格的程序，这也是为了避免一些地方跟风改名。如今每个地方都有人大、政协，黄山改名徽州，应该拿到当地两会上讨论、论证、投票。

记者：有人认为黄山如果改回徽州需要的行政

成本需要1亿元。

李辉：我很奇怪这个数字是如何得来的。另外，有些所谓的成本是不用计算的，比如二代身份证都有时间年限，它不存在更换问题。此外，我们恢复地名时有人喊“成本”，那当初改地名时为何没人说成本呢？这应该是地方政府修正自身错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记者：有人认为，真正的徽州应该包含婺源、绩溪等代表了徽山徽水的地方。您怎么看？

李辉：行政区划是一个长年形成的东西，婺源早在民国时就划到了江西，这种涉及跨省的地方归属，要恢复是很难的；但是绩溪在安徽省内，要恢复很容易。当然，当务之急是恢复徽州这个地名。

记者：您多年持续关注地方改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李辉：恢复徽州是文化人的一种情怀，它不是虚的东西，而是和一个地方具体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例如中国各地过去的乡贤文化，它是中国历代农村文化的支撑。乡贤靠的是道德权威，靠他们的文化教育、对民生的关注，正是依靠这种情怀，我们过去的文化能够得到保护。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质疑如何熬成了一锅粥》，其实就是希望我们不要把对改名的诸多质疑混为一谈。由于中国文化断层太多，我们需要认真关注地名更改可能引发的问题。

他山之石

在美国想修改地名，要比想象中困难。建立于1890年的美国地名委员会负责全美地名的标准化，首要原则是正式的命名一定要符合当地使用习惯。该委员会在修改地名上遵循3条政策，第一是通用，该委员会会尽可能阻

止修改地名，除非这种修改“非常有必要”；第二是与当地用法一致，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修改的地名才会与当地用法背道而驰；第三是贬义地名与重复地名要慎重审核，避免出错。改名的困难体现在了具体的

申请步骤上，以爱达荷州为例，如果当地某申请人或者组织想申请修改地名，他要经历“申请人—美国地名委员会—爱达荷地名咨询委员会—爱达荷地名委员会—美国地名委员会”这样一个完整的申请过程。